



ZHONG GUO GONG CHAN DANG DE CHUANG LI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张 静 如 王 朝 美

王 德 京 黄 福 通

河 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石家庄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张静如 王朝美

王德京 黄福通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6 1/2印张 2插页 159,000字 印数：1—25,000 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86·21 定价：0.60元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初期工人运动	(13)
(一) 工人阶级的长成	(13)
(二) 工人阶级的境况	(24)
(三) 工人斗争的发展	(32)
(四) 工人阶级的特点	(45)
小 结	(50)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52)
(一) 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	(52)
(二) 五四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69)
(三) 与改良主义的第一次交锋	(85)
(四) 反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斗争	(93)
(五)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	(101)
小 结	(117)
第三章 各地共产主义组织	(119)
(一) 共产国际的帮助	(119)
(二) 上海的共产党组织	(124)
(三) 北京的共产党小组	(140)
(四) 湖北的共产党支部	(146)
(五) 广东的共产党小组	(151)
(六) 山东的共产党小组	(156)
(七) 湖南共产主义者的建党活动	(161)

(八) 在法国的共产党小组	(171)
小 结	(177)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80)
结束语	(196)
后 记	(203)

导 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它诞生于六十年前，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使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但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的阻挠，中国并没有能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畸形的社会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国家极端贫困、落后。要摆脱这种状况，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唯一的出路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

人民是永远不会被征服的。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七十余年里，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近代中国革命第一阶段即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高潮，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它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一次有力的打击。但是，这次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在帝国主义的干涉下，孙中山被迫妥协，把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于是，政权重新落入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人物之手，革命归于失败。

袁世凯篡夺政权之后，立即多方面加强独裁统治。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袁世凯令人在上海车站暗杀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以打击国会中的国民党势力。六月，为消灭国民党的军事力量，袁世凯连续发布了撤免三个国民党督军的命令。接着，在不

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北洋军就打败了各省讨袁军，控制了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使袁世凯初步实现了武力统一计划。随后，袁世凯又采用武力威胁手段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总统，并下令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以其御用机构政治会议行使国会职权。次年五月，袁世凯废除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了《中华民国约法》。新约法规定“大总统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国会没有弹劾总统的权力，立法院由总统召集，参政院为总统咨询机关。新约法还规定总统有颁给爵位之权。这样，总统的权力几乎大到与专制帝王相同。袁世凯确实想当皇帝。为了准备复辟帝制，他指令约法会议通过总统选举法修正案，使自己实际上成为终身总统；发布授卿令，全盘恢复清朝的旧官制；下令尊孔，规定全国中小学恢复读经。当然，袁世凯也知道独裁统治不得人心，会遭人反对。所以，他先后颁布《治安警察条例》、《乱党自首条例》、《报纸条例》、《惩办国贼条例》，并通过全国各城市的特务机关，监视、侦察反袁组织及活动，屠杀革命者和人民群众。

为了巩固统治、复辟帝制，袁世凯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用国家主权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一九一三年四月，袁世凯政府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借款合同。合同中规定，银行团垄断借款、指定用途、稽核盐务，这就使中国的财政被帝国主义所控制。诸如此类的卖国行为，接二连三发生。尤有甚者，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袁世凯竟然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指令外交总长陆征祥在日本政府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上签字。

配合着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活动，文化思想领域内也出现一股尊孔复辟的逆流。帝国主义分子古德诺公开宣扬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胡说“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①。封

① 古德诺：《论共和与君主》。

建复古派康有为从一九一三年起就在他办的《不忍》杂志上大肆攻击民主主义，鼓吹尊孔复古。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孔教会、孔道会、尊孔会一类组织纷纷出笼，复古之声甚嚣尘上。

在袁世凯独裁卖国的黑暗统治之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受尽苦难折磨。正如李大钊在一九一三年所描述的：“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载焉，不得安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①。

这样，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现实就向人民重新提出怎么办、向何处去的问题。

资产阶级革命党在这时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与旧势力同流合污，成为新贵；不少人苦闷消沉，离开革命；孙中山周围的一些人先是迷信议会，接着被迫讨袁，失败后虽仍坚持斗争，但却提不出明确的革命纲领，拿不出有效的革命办法。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其不能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无力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

工农群众是迫切需要改善生活的，但换汤不换药的政治制度的变化，使他们感到寒心。什么专制，什么共和，变来变去，还是老百姓遭殃，当官的得利。“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②所以，他们认为再闹腾也不会有什么名堂，只盼时局安宁，家人平安，能维持最低生活。

知识分子曾经寄希望于共和制度，但现实教育了他们，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他们心目中彻底破产。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在西方、在日本都有用的东西，到中国就不灵了呢？看来，中国社会已病入膏肓，无法医治。所以，知识分子中的多数人心灰意冷，忧国而自杀者大有人在，尤以青年居多。

^① 《李大钊选集》，第8页。

^② 同上书，第1页。

该学的都学了，该试的都试了，但都失败了。人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也说不清楚应向何处去。但苦闷和消沉无济于事，中国的唯一出路是继续进行革命。问题是用什么思想武器来指导革命，由什么阶级来领导革命？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没有给中国人留下什么好的印象，这是确实的。然而在没有找到新的理论武器之前，是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还可以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呢？事实证明，这个时候它在中国的生命力没有彻底完结。

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中，有少数急进分子，面对辛亥革命的失败，并不认输。这就是陈独秀、李大钊，以及他俩的战友易白沙、吴虞、钱玄同、鲁迅等人。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华民国是假共和，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并没有实现。不是共和制度本身不好，而应该谴责冒牌“共和”，热爱和追求真正的共和制度。陈独秀说：“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自经此次之实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①虽然陈独秀等人完全不懂得即使实现了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也不懂得在中国根本实现不了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但他们确实揭示了挂着“共和”招牌的军阀政治的真相：共和是假的。这在当时很有作用，是个具有极大吸引力的见解。当人们观察实际生活，懂得了社会混乱、黑暗，乃“专制余波所酿成，决非真共和自身之罪恶”^②以后，就重新有了希望。

陈独秀等人进一步认为，真正的民主政治之不能实现，在于多数国民没有自觉。“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

① 《独秀文存》卷1，第51页。

② 《独秀文存》卷3，第39页。

绝非一物。”^①而不自觉则是因为大多数人“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②，所以要唤醒国民，必须打破封建主义思想的束缚。这种看法虽然片面夸大了思想、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但并非没有一点道理。辛亥革命前的思想发动很不充分，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反对封建旧思想，宣传民主新思想的启蒙运动。当时对封建主义思想也曾作过一定程度的批判，却很不彻底。民主主义的宣传在大量的“反满”喧声中被淹没了，甚至为了“反满”还极力宣扬什么国粹精神，这就使封建旧思想、旧伦理、旧习惯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民主主义没有深入人心。政治上的皇帝被打倒了，思想上的皇帝——封建主义依然统治着人们，成了复辟帝制的得力助手和实现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可见，开展一场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客观现实生活所迫切需要的。陈独秀等人的看法，说出了部分真理，自然给人们以极大的启发，使人们重新获得力量。

打破封建主义思想的束缚，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是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出发点。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发动了一场空前的思想斗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重整旗鼓，向封建主义思想、伦理道德进行了猛烈的冲击。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宣传的中心思想是争人权，即争民主。《新青年》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就明确指出：“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③但是，古之“强暴者”却使“昏弱者”失去自由权利，沦为奴隶。被奴役的人要恢复其本来的权利，就必须争取解放。“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④那么，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可以使人不再沦为奴隶呢？新

① 《独秀文存》卷1，第54页。

② 同上书，第148页。

③ 同上书，第8页。

④ 同上。

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欧美的历史证明，只有共和制，才能使人得以为“人”。陈独秀说：“自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兰西拉飞耶特之《人权宣言》刊布中外，欧罗巴之人心，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晓然于人权之可贵，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贵族，列国宪章，赖以成立。”^①“十八世纪以来之欧洲绝异于前者，惟民主义之赐也。”^②在陈独秀看来，“惟民主主义”的国家，是真正的国家。它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者为公仆；它尊重人权，保障自由，实行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无尊卑贵贱之别；它以经济为命脉，确保个人财产独立。中国人要想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人权，要想生存于现代世界中，必须建设西方式的新国家，组织西方式的新社会。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阻碍中国人得到人的权利的障碍，就是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提倡“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使人民被君权、父权（妇女还要加上夫权）所束缚，受奴役、受欺辱而不敢反抗。其结果，“全国人民以君主之爱憎为善恶，以君主之教训为良知。生死予夺，惟一人之意是从。人格丧亡，异议杜绝。所谓纲常大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民德、民志、民气，扫地以尽”^③。因此，只有彻底批判孔子学说，坚决打倒孔家店，才能使人们思想解放，觉悟提高。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决心动摇孔子这尊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从易白沙发表《孔子平议》第一次指名道姓地公开地向孔丘挑战之后，陈独秀的《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李大钊的《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鲁迅的《狂人日记》等，一篇连着一

① 《独秀文存》卷1，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23页。

③ 同上书，第33页。

篇，篇篇都象一把利剑，击中孔学的要害。什么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的笔下，一文不值，被斥之为“诳人之事”。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并没有采用“骂”的办法对待孔子学说，而是进行细致的、具体的分析和批判，反复地论证必须坚决抛弃它的道理。首先，他们认为，孔子学说不适合于现代的社会生活。人类社会总是在变化着，而“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①。“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②孔丘生长在封建时代，其所提倡的思想、伦理道德，都是适合当时那个时代的思想、伦理道德，而与现代 社会生活完全不相容。一面实行共和政治，一面又要保存专制时代的旧思想、旧道德，结果“必至非驴非马，既不共和，又不专制，国家无组织，社会无制度，一塌糊涂而后已”^③。所以，要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就必须绝对排斥孔子学说，予以批驳，肃清流毒。其次，他们指出，尊孔与复辟是紧密联系着的。孔子学说的主旨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故儒教最为君主所凭藉而利用”^④。有了孔子学说作为工具，封建君主制便得以巩固。可见，“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⑤。既然孔子学说与封建专制关系如此密切，那么，要搞复辟的人，一定要推崇孔子学说，也就是必然的了。“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尊孔，理之自然，无足怪者。”^⑥所以，要反对复辟，就必须反对尊孔，揭露孔子学说的本质，清除其影响。

在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还坚决反对迷信、愚昧、盲从，提倡科学精神。因为封建统治者总是利

① 《独秀文存》卷1，第115页。

② 《李大钊选集》，第80页。

③ 《独秀文存》卷1，第149页。

④ 《吴虞文录》下卷，第12页。

⑤ 《李大钊选集》，第77页。

⑥ 《独秀文存》卷1，第167页。

用宣传迷信，树立偶像，以愚弄人民，使人民俯首帖耳，听天由命，不取反抗。陈独秀等人认为，科学与民主一样，是一种时代的精神。要医治“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只能靠科学精神，即以科学态度观察和对待社会上的一切问题，包括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传统观念和习惯。所谓科学态度就是“综合客观之现实，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①。科学态度排斥迷信，尊重唯物论、无神论，认定鬼神是人虚构的，灵魂是不存在的。什么阿弥陀佛，什么耶稣上帝，什么玉皇大帝，总之，“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②。科学态度排斥盲从，反对轻信，提倡探索真理，主张坚持真理。

“古今来之天经地义，未必永为天经地义，而邪说淫辞，则又未必果为邪说淫辞也。”^③“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④，一切不合理的结论，统统应该推翻。科学的态度排斥保守，反对悲观，主张社会进化，提倡进取的人生观。“自宇宙之根本大法官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⑤。所以，“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⑥。

到一九一七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又开展文学革命，反对封建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当时，象在政治领域一样，在文学领域里，从内容到形式都充斥着封建主义的糟粕。不但内容陈腐，宣扬的是封建道德，而且形式也是呆板的八股式的。同时，写文章包括翻译外国作品，都用文言文；从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也是用文言文编写。封建专制主义的毒汁通过散文、诗歌、小说等等文学形式渗透到人们特别是青年

① 《独秀文存》卷1，第9页。

② 同上书，第228页。

③ 《李大钊选集》，第88页。

④ 《独秀文存》卷1，第230页。

⑤ 同上书，第4页。

⑥ 同上书，第5页。

的头脑中，腐蚀他们的思想，麻痹他们的意志。显然，“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①。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接着，陈独秀写了《文学革命论》，为之声援；随后，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纷起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指斥旧文学说：“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②。因此，他们明确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③。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以磅礴的气势给了封建专制主义、封建伦理道德、封建迷信、封建旧文学以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使历来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旧礼教的信条名誉扫地，使一切封建伦理道德、封建旧制度都在民主与科学面前受到了无情的审判，从而动摇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它以扣人心弦、催人猛醒的声音，召唤着人们奋起斗争，砸碎自己身上的精神枷锁；特别是使广大知识青年从陈腐的封建伦理道德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促进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心，唤起了他们的民主主义的觉醒。于是，在广大知识青年中，掀起了争取民主自由、追求真理、向往未来、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热潮，从而涌现出大批革命民主主义者，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尽管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想体系，民主主义者不彻底抛弃自己的信仰和观点就无法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解放思想，

① 《独秀文存》卷1，第139页。

② 同上。

③ 《独秀文存》卷1，第136页。

则是二者所共同需要的。所以，以打破封建主义思想束缚，实现真正民主共和政治为目的的新文化运动，就必然在客观上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开辟道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章。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的新文化运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和增强的反映。因此，从总的方面说来，它不可能超出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范畴。运动的倡导者和参加者，也多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用以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武器，是从西方学来的资产阶级文化。这种文化，在中国叫新文化，在世界上则已显露其腐朽性。更何况它已不单纯是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主义理论，而夹杂着许多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时代的腐朽东西，所以就更缺乏战斗力。他们幻想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而不懂得在帝国主义时代，这种制度在中国已行不通，不懂得要挽救民族和国家的危亡，使中国人民得到解放，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根本改造中国的社会制度。所以，他们虽然无情地尖锐地批判了以孔子学说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思想体系，却不能给以毁灭性的打击，也不能给中国人民指出解放的正确道路。不管陈独秀等人主观上意识到这一点与否，但进行了三个多年头的新文化运动证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中国起了最后的启蒙的作用之后，生命力就完全枯竭了。

中国革命急需新的革命阶级的兴起，急需新的理论的指引，急需新的政党的领导。如果不能将新的道路展示在人们面前，那么，已经唤起的觉醒和鼓起的勇气，要不了多久，就将暗暗消失。社会总是要发展的，有着优秀革命传统的中华民族也是要前进的。历史作出了符合规律的安排：资产阶级打了败仗，无产阶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长壮大了；民主主义破了产，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传入中国了；在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革命之火，又重新点燃起来了。

共产党是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历史证明，**没有工人运动，或者没有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没有二者的结合，就不能产生共产党。**既然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它就要以本阶级的存在和发展作为社会基础。工人阶级不存在，不可能有工人阶级政党，这是自不待言的；就是在工人阶级刚刚出现的时候，也不可能产生共产党。只有当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人阶级才迫切需要本阶级的政党的领导。可见，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工人运动是共产党产生的阶级基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就必须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但是，自发的工人运动不可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是工人运动的总结，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结晶，创造它需要丰富的知识，而这单靠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列宁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①可见，作为共产党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一个阶级基础，一个理论基础，都是不可少的。如果二者虽然已经存在，但却互不联系，那就都会软弱无力，难以发展。“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不同工人斗争相结合，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页。

就只是一种空想，一种善良的愿望，对实际生活不会发生影响；而工人运动则只会流于零散状态，不会有政治意义，也不会得到当时先进科学的阐明。”^①只有二者结合起来，产生工人阶级的政党，才能使自发的工人运动发展成为自觉的阶级斗争，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

本书所要探讨和叙述的就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以及二者是怎样结合起来而产生中国共产党的。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225页。